

杰出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是中国古建筑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缔造者。

1931年，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梁思成先生与夫人林徽因女士，以及从日本归国的刘敦桢先生一道加入了朱启铃先生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战火纷飞、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梁思成先生与营造学社的同仁们，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考察和测绘了大量珍贵的中国古建筑遗构，为早期中国古建筑史研究积累了极为珍贵的基础资料；他们对于中国古建筑发展体系所进行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梳理，更是开创了中国建筑史学建构和理论体系研究的学术事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营造学社与刚刚组建建筑工程学系（即建筑学院前身）的清华大学合设研究所，梁思成先生任所长，营造学社的学术研究得以在清华大学继续延伸。20世纪60年代，建筑历史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们在梁思成先生的带领下开展了《营造法式》注释等大量的古建筑研究和保护工作。1987年，由梁思成先生主持的“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主要研究者：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徐伯安、楼庆西、郭黛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正是对梁思成先生等学术前辈为研究和保护中国古建筑所作的巨大贡献的最高褒奖。

很高兴此次能通过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系列展之一的“营造`中华”展，对营造学社的历史与部分学术成果进行扼要的梳理和展示，令观者有机会对博大精深的中华建筑文化以及梁思成先生等营造学社先辈们的学术贡献有所初步了解。

同时，2016年也正值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成立70周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梁思成先生致信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向母校提出添设建筑系的建议，并在1946年7月清华大学正式组建建筑工程学系（即今建筑学院前身）之际被聘为首任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坚持于建筑教学一线多年，他所提出的办学宗旨和学术思想，以及他所奠定的理论基础和教育体系，时至今日还在指导和影响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科建设。梁思成先生等学术先驱执着于理想信念、坚持不懈投身建设事业的风范，将激励一代又一代清华建筑学人不断向前。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庄惟敏

2016年4月于清华园



中国营造学社  
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简说

中国营造学社  
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简说

# 中国营造学社 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简说<sup>1</sup>

## Brief Introduction to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Its Bulletin

王贵祥

Wang Guixiang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曾经在1930年至1946年间十分活跃的中国营造学社及学社主办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厘清学社的创办宗旨，与学社汇刊的学术方向，对于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建筑教育史、建筑史学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及其在艰苦卓绝的历史环境下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学史的一部大书，而研读与分析《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则是理解中国建筑史学界前辈学者们的学术理论与学术目标的一把钥匙。

自1930年成立，至1946年并入清华大学，在这17年间，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第一个重要学术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十分活跃。由中国营造学社主办的中国建筑史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更是中国近代建筑学术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厘清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宗旨，探究《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学术方向，对于理解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的建筑史、建筑教育史，以及建筑史学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86年前的1930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建筑学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成立。这一年的7月，中国近代第一本以中国古代建筑为专门研究方向的学术期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正式问世。此后，至1937年6月，在短短7年时间里，先后出版了6卷21期（其中第4卷第3~4期为合刊）。之后，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4—1945年，在极其困难的状态下，采用油印方式，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第1与第2期，从而使《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刊行总卷期数增至7卷23期。

### 学社创办之前的酝酿与筹措

20世纪初的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民族屈辱与社会变革的冲击之后，恍如一系列穿越漫长幽深历史隧道的车辆，突然面对一个广阔、陌生、喧闹的全新世界。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眼光观察世界，也观察中国自身。西方建筑术与中国营造术的巨大差异，及其对国

---

<sup>1</sup> 本文的完成有赖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所助理研究员李菁，及博士后辛惠园、博士生孙蕾的前期资料爬梳与整理。其中本文的最后一节“国际影响”部分，也主要采用了李菁提供的观点与文字，在此特别加以说明。

民、社会与文化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也进入当时中国知识精英的观察与思考范围。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问世，正是滥觞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

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在国际与国内形势变幻莫测、云谲波诡的20世纪初，刚刚进入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建筑领域，需要有一个全新的，既能够与外部的现代世界接轨，又能够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根基之上的学术机构。肩负这一重任的中国营造学社也应运而生。换言之，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经历了一个苦心孤诣的酝酿与筹措过程。从史实的角度观察，在中国营造学社问世之前的1919—1929这十年间，是中国营造学社的一个非常值得引起关注的积累与筹备阶段。不妨先来对这一时期与中国古代建筑术或营造术有所关联的事件作一个简单梳理。

1919年，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昭示了中国近代史上追求“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启蒙运动的发端。正是在这一年，曾在北洋政府任职，刚刚退出政界，寓居津、沪的朱启钤先生（图1），发现宋代将作监李诫所著《营造法式》一书，即刻着手组织陶湘等中国古籍版本专家，对这部古代建筑典籍进行校勘。

1921年朱启钤出使法国，游历英、意、比、德、美、日六国。在这次长途旅程中，他开始用全新眼光观察世界与中国：“见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专书。益望然于明仲此作为营国筑垒不易之成规。”<sup>2</sup>

1923年《营造法式》校勘完成，1925年陶本《营造法式》问世，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这对朱启钤无疑是很大的促进。同年，朱启钤成立了一个学术团体——“营造学会”<sup>3</sup>，这一学会涉及以下两件事情。

其一，这一时期，学会成员朱启钤与阚铎、瞿兑之等，共同收集中国古代营造散佚史书、图籍。有关中国营造研究的早期学术文献《哲匠录》《海书》等论著，也开始辑录。

其二，朱启钤组织学会同仁制作了一些古建筑模型。

“营造学会”的建立缘于朱启钤长期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浓厚兴趣与悉心钻研，它也为后来“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形成一個颇有影响力的前奏。



图1 朱启钤

2 朱启钤：《重刊营造法式后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3 《朱启钤自撰年谱》，载《夔公纪事——朱启钤生平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1928年，朱启铃在当时的中央公园（今日中山公园前身）举办展览，展出历年所收集、制作的书籍、图纸、古建筑模型。（据相关资料显示，朱启铃竟因此负债，甚至出售了自己收藏多年的珍贵文物与丝绸，集资约14万元。）

这次展览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普遍关注，扩大了“营造学会”的影响并推动学术研究的进程。展览引起中华教育基金会高度重视，表示愿意拨款资助相关研究。

1929年，朱启铃的前政界旧友周贻春提示，可以正式上书给中华教育基金会申请补助。6月3日，朱启铃特撰《致中华教育基金会函》：“敬启者夙闻：贵会对于科学文化极力提倡甚深佩仰，鄙人研究中国营造学已二十年。近因环境关系，无力完成尚拟继续进行甚愿。贵会格外设法予以协助，兹特以研究计划之大概送请。察其如荷，同意不胜感激。……营造学实包括美术科学及文化三者，而文化委员会实负有扶持发育之使命。鄙人昌明绝学，阐扬国光概念，世界之大同，重违同仁之公意，用特具函贵会商请协助预计完成中国营造学之专门著述。期五年以来，此五年中，其前三年经费约需八千元，后二年，或须稍增如荷。”<sup>4</sup>

11月19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给朱启铃复函：“迳复者准十一月十日。台函称拟自十九年一月起开始研究中国营造学，同时依照所编预算按季支用补助，拟请准由本年度补助费内开支，移居及设备等多项费用并附。”<sup>5</sup>

概而言之，自1930年始，“营造学会”可获得中华教育基金会应允每年拨款15000元补助。朱启铃先生的这些努力，当为中国营造学社之先声与基础。

## 学社的创立与汇刊的创办

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正式宣告成立。最初在学社内首设文献部，并聘阚铎为文献部主任，以翟兑之、刘南策辅助之。在最初制订的五年研究计划中，朱启铃提出营造学社主要目标：“第一年工作：整理古籍，拟定表式；第二年工作：审定已有图释之名词；第三年工作：制图撰说；第四年工作：分科编纂；第五年工作：编成正式全篇。”<sup>6</sup>不难看出，最初的营造学社，沿袭了“营造学会”时期所具有的晚清朴学特色之注重文献考证的研究思路，侧重于文献收集与整理。

1930年2月，学社甫一成立，即决定发行不定期学术研究汇刊。同年7月，

---

4-6 《社事纪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7月第1卷第1期。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正式创刊。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建筑刊物的发行是建筑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美各国，建筑刊物已充塞书肆。其中如英国的《建筑》（*The Builder*）和美国的《美国建筑界》（*American Builder and Building Age*）颇具影响。

相比之下，直至1930年，中国建筑界还没有一份属于中国人自己创办并主持发行的建筑刊物，遑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专刊。然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没有一个学术阵地是行不通的。对中国营造学社来说，这时创办《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似已变得势在必行。

在《汇刊》创刊号，即第1卷第1期中，朱启钤撰文《中国营造学社缘起》，明确提出《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宗旨是：“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造将来之新建筑。”<sup>7</sup>“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及其轶闻，以科学方法整理文字，汇通东西学说，籍增世人营造之智源。”<sup>8</sup>

## 梁思成、刘敦桢加盟学社

如果说学界先驱朱启钤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奠定了深厚基础，那么，他慧眼识珠，邀请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梁思成（图2）与林徽因，及曾在日本留学的刘敦桢（图3）三位学者加盟学社，则正式开启了建构中国建筑史的学术之路。

在进入学社之前，于东北大学任教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已开始组织学生对沈阳地区清代建筑进行测绘。梁思成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的研究写作，在这时可能也已在酝酿之中。1930年，梁思成应邀正式来到中国营造学社。甫一入社，便显露出卓越的学术潜质。进入学社之初，梁思成提出两个观点：第一，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不能仅止于古籍整理层面，应当用科学考古和现代科技方法与手段对建筑实物进行调查与测绘；第二，古代建筑研究，应以中国建筑史建构与中国建筑体系阐释为主要目标。

基于这一见解，梁思成向朱启钤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必须开展田野调查与测绘工作；二是要由清代建筑向上沿波溯源，以探索中国建筑体系发展的历史脉络。



图2 梁思成



图3 刘敦桢

7 朱海北：《中国营造学社简史》，《古建园林技术》，1999年第4期。

8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7月第1卷第1期。

朱启铃听取了梁思成的学术建议，认识到“须为中国营造史，辟一较可循寻之道路，使漫无归束之零早材料得一整比之方，否则终无下手处也。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的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sup>9</sup>

刘敦桢加盟营造学社之初，持与梁思成一致的科学态度，将对古建筑作科学考察及建构中国建筑史的思路作为学术主旨。梁、刘、林等学术巨擘的加盟，使中国营造学社有了宽广的学术视野与深厚的学术基础。自此，中国营造学社成为以社长朱启铃和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为核心，协同诸位同仁共同合作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民间学术机构：法式部负责中国古代建筑实例调查、测绘与研究；文献部负责史料文献收集、整理，同时编纂汇刊。



图5 鲍希曼有关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的著作

## 华北地区的学术考察

基于如上学术宗旨，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初至全面抗战爆发（1932—1937年）的仅仅不足6年的时间内，在十分艰难的交通条件、十分简陋的测绘工具，以及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下，营造学社却展开了相当全面而扎实的学术考察与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至今仍然令人感到震撼的学术成果。

在华北地区古建筑考察之前，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的发展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领域中，在这一时期之前，几乎还没有中国人的声音，换言之，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前，以及中国营造学社全面开展华北学术考察与研究之前，中国建筑史学的话语权定义，或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研究主体，似乎并不在中国人这里。

在此，需要特别提出的一点是，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并不是从朱启铃、梁思成、刘敦桢开始的。20世纪初中国建筑史学领域，活跃着一批外国学者的身影，他们是中国建筑史学最早的探路者，其中不乏一些我们熟悉的人物，如日本的关野贞（图4）、竹岛卓一、伊东忠太（Ito Chuta）、常盘大定，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et）、沙琬（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瑞典的喜仁龙（Osvold Siren），德国的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图5），等等。其中，除了鲍希曼之外，其余学者的研究文章几乎都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初的几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被翻译刊载过，或在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章中被提到过。

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后，以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行之初，日本与西方学者，在中国建筑史学领域中，一直保持着十分活跃的声音。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之前，中国建筑史学者的



图4 关野贞拍摄的嵩山汉阙

<sup>9</sup> 朱启铃：《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7月第1卷第1期。

学术实践，还无力全面占据中国建筑史学的主体话语权。而当时的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学者，面临的几乎完全不清晰的学术前景，因为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实例考察与建筑测绘还刚刚开始。

正是在这既艰难困苦、又充满学术挑战的历史时期，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们在梁思成和刘敦桢的率领下，从1932年起到1937年日本入侵之前，在华北地区137个县市，调查了古建筑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的测绘图有1898张<sup>10</sup>。如果联想到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怎样一个艰难困苦的历史时期，人们就不会不对中国营造学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油然而生敬仰之心了（图6）。

正是在这一时期的系统考察与研究中，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们循着历史的足迹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基本上摸清了中国建筑自辽宋时代至清代的轨迹，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特别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后阶段，即1937年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梁思成与林徽因及其同仁在山西五台山的考察中发现了建造于唐代大中十一年（857年）的佛光寺东大殿，更将中国古代建筑实例遗存的时间，提前到了9世纪中叶，从而突破了日本学者此前提出的，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最早遗存实例仅可溯至11世纪的断言。

也就是说，这短短6年的华北地区古建筑考察研究，为后来的中国建筑史学建构与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系统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今日中国建筑史学领域中熟知的那些具有重要历史节点意义的古建筑遗构，如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登封嵩岳寺塔等，都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所发现并测绘的。这是中国营造学社学术研究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创刊初始

任一学科的学术研究，必应有其学术的阵地与学术的喉舌，而这一学科领域的学术刊物，就扮演了这一阵地喉舌的角色。在中国建筑史学的建构过程中，由中国营造学社主编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成为近代史上由中国人创办的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学学术刊物。



图6 朱启铃为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纪念所题的对联

<sup>10</sup> 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图7，以下简称《汇刊》）创刊之初的前几期文章，外国人的论文或译文，占了很大篇幅。如第1卷第1期英国人叶慈（Dr. W. Perceval Yetts）撰《英叶慈博士营造法式之评论》与《英叶慈博士论中国建筑内有涉及营造法式之批评》。第1卷第2期《叶慈博士据永乐大典本法式图样与仿宋刊本互校记》（附译文及《北平图书馆馆刊记事》）、伊东忠太《伊东忠太博士讲演支那之建筑》，及译自《美国亚东社会月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劳福尔博士（Dr. BertjodLaufer）的文章《建筑中国宫殿之则例》。

第2卷第1期将清代来华传教士王致诚（FerireAttiret）于1743年致达索（M.d' AssautToises）的一封信关于圆明园的函译成中文发表。同一期发表了英人锡寇克（Arnold Silcock）介绍《汇刊》第1卷第1期的一篇文章，并附英文原文。从这些细微小事上，颇可见出这一时期中国建筑史学领域微妙而复杂的学术心态。

第2卷第2期刊载了亚东学会华北支会月报第24期英国人爱迪京（Joseph Edkins）氏撰《中国建筑》。同期刊载法国人德密那维尔（P. Demiéville）《评宋李明仲营造法式》一文的译文及法文原文。第2卷第3册不仅续登了清代来华传教士王致诚《乾隆朝西洋画师王致诚述圆明园轶事》（法文），且转载了《美国亚东社会月刊》所载美国迈阿密大学卡罗尔·马隆（Carroll B. Malone）的文章《建筑中国宫殿建筑之则例》（*Current Regulations for Building and Furnishing Chinese Imperial Palaces, 1727-1750*）。有趣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像以往那样附中文译文，而是原文照登。这究竟是时不有暇，还是学术策略的改变，尚不得而知。同一期的《（民国）十九年本社事业进展实况》和《建议请拨英庚款利息设研究所及编制图籍》两文，特别附加了英文译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希冀达到某种国际化程度的愿望。

也许是冀助于梁、刘两位学者加盟并崭露头角的东风，第3卷第1期始，情况有了明显改观。这一期发表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与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两篇论文，及刘敦桢译自日本学者的两篇文章：是滨田耕作的《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与田边泰的《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

第3卷第2期之后，一改前两卷以外国人文章为主格局，以梁、刘的研究力作为主的中国学者的文章，渐渐占到主导地位。



图7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 建筑研究的历史转折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前及之初，除了乐嘉藻以文献为基本线索的《中国建筑史》之外，主要是一些外国人的研究。如19世纪后期英国詹姆士·弗格森的《印度及东洋建筑史》以及20世纪初伊东忠太的《东洋建筑概说》和《支那建筑史》《支那建筑装饰》以及关野贞、常盘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迹》等。在这些外国学者，特别是个别西方学者眼中，充满了对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与文化的蔑视，如在英国人弗莱彻尔的《比较建筑史》中所绘制的建筑之树，将自古至今的西方建筑看作世界建筑历史发展的主干，而在这棵世界建筑之树上，中国建筑被看作非历史的旁枝左杈。日本人伊东忠太所引英国人弗格森撰写的《印度及东洋建筑史》中甚至用极其蔑视的语言说：“中国无哲学，无文学，无艺术。建筑中无艺术之价值，只可视为一种工业耳。此种工业，极低级而不合理，类于儿戏。”<sup>11</sup>

近代以来，作为一个停滞的传统农业国家，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其学术起步是相对比较迟滞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学与西学在融合与冲突中相互碰撞。中国人渐渐了解与萌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学概念，如最初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第一次将“建筑学”作为学科科目列入大学堂的课程系列中。

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庚子赔款”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这一时期的中国开始对外派遣留学生，其中建筑学科的留学生所去的目的地国家，主要是日本和美国。

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在提倡西方近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的同时，还强调文化与历史研究的“民族性”，从而出现了“用西方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这一东西方思想交融的学术思想。换言之，朱启铃关注中国营造学及成立营造学会，直至最终建立中国营造学社这一历史实践，是对当时流行的这一“国学”思维的某种曲折反映。

---

<sup>11</sup> 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王云五、傅纬平主编，陈清泉补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页。

同时，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立，也适应了当时中国建筑设计领域开始流行的“中国固有形式”建筑设计的实践要求。当然，这些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因为中国营造学社最大的学术贡献，还是在中国建筑史的建构与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理论诠释上。

尽管《中国建筑史》是由中国人乐嘉藻撰写的第一部建筑史，但由于其缺乏现代科学考察与史学建构的理论基础，还不足以构成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史学专著，更像是一部基于文献收集与整理，既缺乏实证案例的支持，又缺乏科学与系统的建筑史学体系建构，难以与当时国际上既有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相抗衡。

梁思成与刘敦桢等先生是中国建筑史的奠基人，这一点已成定论。正是从他们两位开始，中国建筑史学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这里以梁思成先生为例，对中国建筑史学在新时期的转折作一个分析。

1928年8月梁思成回到中国，携妻子林徽因赴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在教学研究的间隙，二人测绘了沈阳北陵的清代建筑，并萌生了撰写一本《清式营造则例》的想法，同时，还完成了为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准备的《中国雕塑史》讲课提纲。虽然是一个提纲，但文字与插图已可谓洋洋大观，其思路之明确、架构之清晰、结构之完整，俨然一部学术大著缩写本，反映了梁思成的扎实功力。

1931年6月，回到北京的梁思成开始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部主任，后又改任法式部主任，正式开始了他在中国建筑史方面的开拓性研究生涯。次年，即1932年3月出版的《汇刊》第3卷第1期，梁思成与林徽因各自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梁思成）与《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林徽因）。

接下来的第3卷第2期主要内容，是梁思成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的系统研究。这里不禁令我们产生一个疑问，在当时交通很不便利、测绘手段比较原始的情况下，牛刀初试的梁思成，为什么放着北平周围众多的宫殿、坛庙、园林与寺院不去研究，却舍近求远、舍易求难地以一座地址偏僻、结构复杂的蓟县古寺建筑开展测绘、考据与研究？

事实上，学社之初的研究策略，恰恰是以故都北平或清代宫苑为主要研究目标的。第1卷第2期的《元大都宫苑图考》，是透过史料及北平现况对元大都的研究。第2卷第1期有《圆明园遗物文献之展览》，第2卷第2期则以《热河普陀宗乘诵经亭》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几期同时关注的还有清代建筑的一些木石做法。



图8 独乐寺观音阁



第1卷第2期的《元大都官苑图考》一文中，还提道：“紫江朱先生，设中国营造学社于北平，从事于清故宫之研究。”<sup>12</sup>第2卷第1期《本社纪事》中，又特别提道：“本社近年工作，专注于北京宫殿……”<sup>13</sup>可知创立之初的中国营造学社，着力于现有古代建筑实体，特别是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官苑建筑的研究，还没有建构中国建筑史的明晰概念。

事情的转机正是从梁、刘、林三位学者加盟营造学社开始的。1932年第3卷第1期，发表了刘敦桢译自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的文章《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显然，三位学术先驱加盟学社伊始，就将目光转向中国早期的汉、六朝、唐代建筑。

同年6月的第3卷第2期，梁思成发表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和《蓟县观音寺白塔记》。在有关独乐寺的这篇堪称经典的论文中，梁思成通过文献与考古两方面证据十分肯定地论证了独乐寺观音阁（图8）与山门（图9）重建于辽统和二年，即公元984年。其论证之详，考据之深，运用实际测绘数据并与宋《营造法式》比对之细密，是这一类论文中最具开创性的。

显然，三位学者都开始思考中国建筑的史学建构与中国建筑体系的科学诠释这两个根本问题。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就要梳理历代古建筑实例遗存现状。也就是说，要弄清历代老祖宗留存下来的家底究竟有多少？尚存最古老的建筑遗存，究竟有多早？然而，在20世纪之初，任何人面对这一问题，都会是一脸茫然。



图9 独乐寺山门

<sup>12</sup> 元大都官苑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2期。

<sup>13</sup> 本社纪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2卷第1期。

## 中国建筑的史学建构

这其中也反映出梁、刘二人共同的学术情结：究竟能不能发现比当时已知更为古老的中国建筑，特别是木构建筑？

《汇刊》第3卷第4期《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中提到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的观点：“我们的同志常盘和关野认为中国木建筑没有确实比1038年更古的，在1931年《通报》第221及413页上我已将此点讨论。上列文字若以为可用，你也可以发表。”<sup>14</sup> 这里的1038年，是以日本学者关野贞所考察过的山西大同华严下寺薄伽教藏殿的建造时间为依据的（图10）。《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常盘与关野观点一个具体而直接的辩驳。伯希和这里所说的上列文字，是他关于敦煌第130窟外檐檐廊年代问题的论文，他认为“这个檐廊的年代所以是公元980年”，他还认为第120A窟檐廊“这一处檐廊的年代所以是976（年）。”<sup>15</sup> 显然，在1931年《通报》第221页及第413页上的讨论意见中，伯希和已经对常盘、关野的观点持了否定的态度。



图10 大同上华严寺薄伽教藏殿

这里出现两个不同观点：日本学者常盘大定与关野贞认为，中国木构建筑遗存中没有比薄伽教藏殿（1038年）更早实例的观点；梁思成与伯希和对于这一说法表示质疑的观点。然而，仅仅质疑是不够的，问题是如何以实例证明，确有比薄伽教藏殿更早的尚存遗构。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就是对这一严肃问题所作的科学回答。

这一思路在此后研究中继续着，如第3卷第3期，刘敦桢发表《北平智化寺如来阁调查记》。第3卷第4期，梁思成发表《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梁先生在这篇文字的“寺史”一节，还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研究的基本态度：

所谓“寺史”并不是广济寺九百余年来在社会上，宗教上，乃至政治活动上的历史，也不是历代香火盛衰的记录，也不是世代住持传授的世系，我们所注重的是寺建筑方面的原始，经过，和历代的修葺，和与这些有关的事项。<sup>16</sup>

显然，他所注重的是“建筑方面的原始，经过，和历代的修葺，和与这些有关的事项”，亦即对某一建筑案例之历史的研究。这显然继承了他所接受的巴黎美术学院式的西方艺术史研究传统：从个体建筑案例研究出发的建筑历史研究。

14-15 《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梁思成，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4期，第125页。

16 梁思成：《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4期，第8-9页。

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营造学社迁至大后方的四川李庄，在极其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还出版了油印本第7卷的1、2两期。其中梁思成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纪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的论文，以充分的论据，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历史遗存，提前到唐代的大中十一年（857年）。

也就是说，从1932年梁、刘二君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之后，学社的研究思路与《汇刊》的学术路径，主要是在“建构中国古代建筑史”这一基本宗旨之下，在田野调查、实例测绘和史料发掘与整理两方面逐渐展开的，并取得初步成效。短短数年时间，在学社同仁们的齐心协力下，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基本轮廓已逐渐清晰，建构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基本历史框架基础，无论在史料的系统性上，还是在实例遗存的年代性上，都具备了基本条件。在抗日战争的隆隆战火下，在冻馁环境中挣扎的前辈学者，已经开始尝试中国建筑的史学建构。

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图11），尤其是他那著名的经过曲折颠沛才重新发现并于他辞世之后才正式发表的英文版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图12），正是在这一时期研究并撰写完成的。



图11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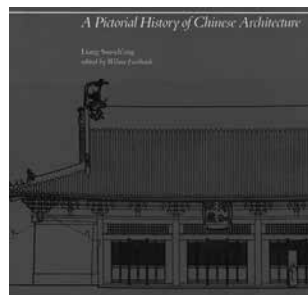


图12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

## 中国古代建筑的体系建构

在对广济寺三大士殿的研究中，梁思成又提出了中国建筑史上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古代建筑结构名词术语的时代性问题。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发展虽然芜杂繁复，但可以通过两个基本历史文件加以归纳、界定，这就是后来梁思成提出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两部文法书：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

至于分析的方法，则以三大士殿与我们所知道的各时代各地方的建筑比较，所以《营造法式》与《工部工程做法》，还是我们主要的比较资料。此外河北、山西已发现的辽代建筑，也可以互相佐证。<sup>17</sup>

《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这篇论文的发表时间是1932年，是梁思成刚刚加入中国营造学社的第三年。这时他不仅已经完成了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文法书的《清式营造则例》的著述与出版，而且已经对宋《营造法式》的基本术语有了

17 梁思成：《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4期，第20页。

充分的了解与把握。可以推测，他参加学社几年，甚至更早时期，他已经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两部文书——宋《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学习、探究。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清式营造则例》，是结合自己的测绘考察实践，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所作的简要诠释，以期为从事古代建筑研究的专业人员提供进入这一陌生领域的方便法门。同时，通过对辽宋建筑实例考察，为后来的宋《营造法式》研究，积累了实际例证。

由此可见，在梁、刘加盟学社之后，中国建筑研究集中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基于历代古建筑实例遗存发现、考察与研究的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历史性架构；二是基于宋代《营造法式》与清代《工程工部做法则例》的古代建筑造型与结构的体系性架构。

早在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之前，梁思成已经意识到对中国古代建筑造型和结构体系建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故而才有他在实例测绘及与工匠交流学习的基础上完成的有关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体系的第一部系统专著《清式营造则例》，并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第一部经典语法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梁先生积十余年之力，带领他的弟子从事的《〈营造法式〉注释》，正是接续了他的第一本专著《清式营造则例》而初步完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学习与研究的第二部经典语法书。这两部书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体系，特别是北方官式木构建筑体系的基本语法书，是理解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两把钥匙。

在《汇刊》中，可以看到这种为理解与建构古代木构建筑体系的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从《汇刊》发表的文章看，这种体系建构的研究是交叉进行的。从第1卷第1期，到第7卷第2期，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式与则例，以及种种做法的探讨，一直在持续。探索的范围，并未局限于官颁宋《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上。南方流传的两部古代建筑做法书，即姚承祖《营造法原》和民间流传明《鲁班营造正式》，也成为前辈学者的关注对象。

恰如一场戏剧的总结性结尾一样，在《汇刊》最后一期，即第7卷第2期上，梁思成发表了《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阐明了前面一系列法式、则例，及各种做法的研究，是要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体系，发现并建立一个可理解的体系。

如梁先生在《汇刊》第7卷第1期中所撰《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指出的：“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sup>18</sup>

而要了解这一体系，就要诠释与理解这一体系的基本模式语言，即一种建筑体系可以被理喻的文法。第7卷2期梁先生所撰《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中亦指出：“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而要研究那种语言的文学，当然此路不通。不知道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也是一样的不可能，所以要研究中国建筑之先，只有先学习中国建筑的‘文法’，然后求明了其规矩则例之配合与演变。”<sup>19</sup>这里所谓的文法，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建造方式与建筑体系。

## 历史建筑的保护与设计

除了中国建筑史之史学建构与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体系建构这样两个最为基本的围绕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展开的学术方向之外，《汇刊》中还贯穿了另外两条学术路线，而这两条路线，则着眼于学术研究，特别是建筑史研究，为当下服务的理念。

学术路线一为历史保护。

历史保护，或古建筑保护、文物建筑保护，以及现今十分流行的历史遗产保护等概念，其实，都是在说对历史上遗存下来的古代建筑、雕塑、绘画及实用器物等历史作品的保存与保护问题。这是与建筑史和艺术史研究关联最为密切的一个领域。首先，要保护好这些历史遗存珍品，把它们作为民族文化的遗产，传承给我们的后人；其次，是发掘出这些历史珍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使其成为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历史的实例见证。

稍微梳理一下，就可以发现，在《汇刊》中贯穿着一条与古建筑保护有关的学术线索。虽然篇幅不是很多，在总数有23期的《汇刊》中所占比例也不是很大，却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时间跨度，从梁、刘加盟学社之始就已开始，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前夕的1937年；二是梁、刘两位学术巨擘，都是历史建筑保护的积极倡导者与参与者。这反映了他们对于历史建筑保护研究所持的积极而鲜明的学术态度。

---

<sup>18</sup> 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第1期，第6页。

<sup>19</sup> 梁思成：《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第2期，第62页。

学术路线二为建筑史研究应该对当下建筑设计创作有所支持与服务。

这一点从《汇刊》第6卷第2期的编辑主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期最主要的内容是在之前几年建筑史研究的基础上，为当时的中国建筑师提供一个在进行中国传统风格建筑设计时可供参考的设计图集。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接近抗战胜利之时，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已经开始构想国家未来的建设问题。在《汇刊》第7卷第2期，强扶病体的林徽因先生发表了《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一文，详细介绍了当时欧美现代住宅设计的一些方法、政策与资料及城市发展的历史，并附有城市规划与住宅设计的相关图例。在本文结束部分，林先生十分恳切地说：“我们一切正在开始，宜早拟研究定出计划，逐步推进不宜失却机会。”<sup>20</sup>足见这些学界前辈对于国家未来建设与发展的殷殷之心。

这一期还发表了《中国营造学社桂辛奖学金民国三十三年度中选图案》。这相当于1944年由中国营造学社组织的设计竞赛的结果发布。这是一个农场的详细规划与建筑设计方案竞赛，第一名获得者就是后来著名的清华大学教授朱畅中先生。显然，学社的前辈们，在翘首盼望抗战胜利的同时，已经在为国家未来建设与规划设计人才的培养、选拔而未雨绸缪。

其实，第7卷第1期梁先生文章：《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贯穿的主线仍然是与当下关联最为密切的两条：其一，历史建筑的保护问题；其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如何服务于当下设计创作问题。

关于其一，梁先生在悉数当时弥漫全国的对历史建筑种种破坏之事实的基础上，强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sup>21</sup>

关于其二，梁先生提出了在战后如何创造具有中国文化特征之现代建筑的探索性课题：“无疑的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如何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技艺之特点，……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则真是问题了。”<sup>22</sup>



20 林徽因：《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第2期，第61页。

21 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第1期，第6页。

22 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第1期，第8页。

梁思成当时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创造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现代建筑问题，是一个几十年来一直被建筑师们讨论、争辩、探索，甚至批判的大课题，至今难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由此说明梁先生在学术上的前瞻性、敏锐性与深刻性。

## 大后方的营造学社及其后续影响



图13 梁思成和莫宗江在李庄营造学社工作室内



图14 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设建筑所契约

抗战期间，中国营造学社随西南联大离开北平。学社成员刘致平最先抵达云南昆明，将社址安置在循津街的“止园”。由于日本飞机轰炸，社址又迁往市郊麦地村兴国庵。刘随即请梁、刘两家速来昆明。社长朱启钤坚守北平，并委托梁、刘调查西南地区古建筑。

1938年始，梁、刘二人分别带领莫宗江、陈明达等，调研了云南16县市、四川37县市、陕西16县市及西康地区。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北部，昆明地区面临高度危险，学社迁往四川宜宾南溪李庄。这里一时间成为“中央研究院”“博物院”“同济大学”等文化机构和人才荟萃的学术中心。

由于日军占领西南大片地区，这一时期学社经费陷入极度困难境况，但先辈们仍然继续田野勘察与古建筑测绘：梁思成勘察并测绘汉阙；刘敦桢发表《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刘致平对成都等地民居进行调查和测绘，徒步环云南滇池对民居建筑进行考察调研，完成《昆明湖环形记》《昆明东北乡调查记》《云南一颗印》等，成为中国民居调研第一人；莫宗江（图13）调查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参加了成都王建墓考古发掘。莫、陈两先生还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绘制了应县木塔模型图，为博物院制作模型打下基础。

1943年，尽管环境和财力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梁思成依然决定恢复《汇刊》。1944年和1945年10月，学社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出版了第7卷第1、2期。梁思成在第7卷第1期中发表《复刊词》。这一年刘敦桢赴中央大学（现东南大学）建筑系担任教授，陈明达赴重庆工作。

1945年，梁思成从长远考虑准备创办清华大学营建系（即后来的建筑系，今建筑学院）。1946年10月，朱启钤、梁思成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工学院院长陶葆楷签订协议（图14），将中国营造学社并入清华大学。

自此，中国营造学社的部分成员和南迁的资料以及在抗战时期调查研究的成果与资料都随梁思成转移到了清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研究也得以在清华大学继续延伸。同时，以刘敦桢为代表的南京中央大学也在继续着中国营造学社

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了江南古典园林和南方传统民居。

1949年之后，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渐渐分布在新中国各个高等院校建筑系的学术讲台上，或是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与保护机构中，开启了现代中国建筑教育的创始之路。他们培养的学生，不仅遍布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与古代研究与文物建筑保护机构，也逐渐建立起了完善的建筑学与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等学科的建筑教育体系。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下，中国拥有建筑学的大学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前屈指可数的几家，增加到200多家。虽然中国营造学社形式上解体了，但受到这一学术机构影响的学术活动一直在持续与深入发展中。梁思成及其带领的学术团队在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图15），就是对梁思成先生从中国营造学社到清华大学这一整个时期学术生涯的最好总结。

## 中国营造学社及其汇刊的国际影响

中国营造学社，以及学社学术研究标志——《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以下简称《汇刊》）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广为传阅，也远传欧美诸国（欧美不少国家争相转载《汇刊》学术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研究中国建筑学者的极大重视，研究中国建筑的国际学术交流由此也变得日益频繁。

1930年，英国学者爱迪京在亚东学会华北支会月报上发表了《中国建筑》一文，介绍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研究。<sup>23</sup>同时，在《汇刊》上先后发表多篇欧美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建筑研究的学术文章，如《英叶慈博士营造法式之评论》《英叶慈博士论中国建筑内有涉及营造法式之批评》<sup>24</sup>《建筑中国宫殿之则例》（《美国亚东社会月刊》）<sup>25</sup>等；这一时期，除弗莱彻《比较建筑史》对中国建筑多少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论述之外，美国学者索柏与斯格曼在他们合著的《世界艺术史》中有专门章节论述中国的艺术与建筑。而索柏与斯格曼写的中国建筑部分，基本上是基于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成果而完成的。同时，作为对日本建筑也有很深研究的学者，对中国与日本建筑，往往是相互参照比较研究的。<sup>26</sup>这些欧美学者

<sup>23</sup> 陶宗震：《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文献——陶本“营造法式”校勘出版始末记》，《南方建筑》，1993年第3期。

<sup>24</sup> 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7月第1卷第1期。

<sup>25</sup> 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7月第1卷第2期。

<sup>26</sup> 赵辰：《域内外中国建筑研究思考》，《时代建筑》，1998年第4期。



图15 国家自然科学奖荣誉证书

的中国建筑研究迹象，足见“中国营造发皇之影响”<sup>27</sup>。

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汇刊》是“一种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学术资料的杂志，是任何一个想要透过这个学科表面，洞察其本质的人所必不可少的”。<sup>28</sup>这对发行年度数量不足十年，却有可能流芳百世的中国近代一部建筑学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一个最好的评价。

27 朱启铃：《社事纪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90年12月第1卷第2期。

28 刘致平：《忆“中国营造学社”》，《华中建筑》，1993年第4期。



中国营造学社学者  
活动年表

---

1945

# 中国营造学社学者 活动年表



朱启钤（1872—1964）

## 1930—1931

---

193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同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创刊。创办人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等职，同时是一位杰出的实业家、古建筑专家、文物收藏家。



梁思成（1901—1972）



刘敦桢（1897—1968）

---

梁思成、刘敦桢先后于1930年、1931年加入学社，并分别担任法式部和文献部主任，成为学社的研究带头人。

学社设文献和法式两部，前者重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后者重实物调查、测绘和《营造法式》研究。



林徽因（1904—1955）

1932年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



年仅28岁的林徽因在1932年3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1期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文，这是她的第一篇中国古建筑论文，却对学术界影响深远。

1932年4月，梁思成、邵力工等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辽统和二年即公元984年）进行了考察与测绘。梁思成在同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2期发表了其第一篇中国古建筑考察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



《清式营造则例》（1934年出版）

1932

同年，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脱稿（1934年出版），该书为研究中国古建筑（特别是清代建筑）的重要入门读本。

1933年林徽因在正定开元寺钟楼梁架上



1933年梁思成在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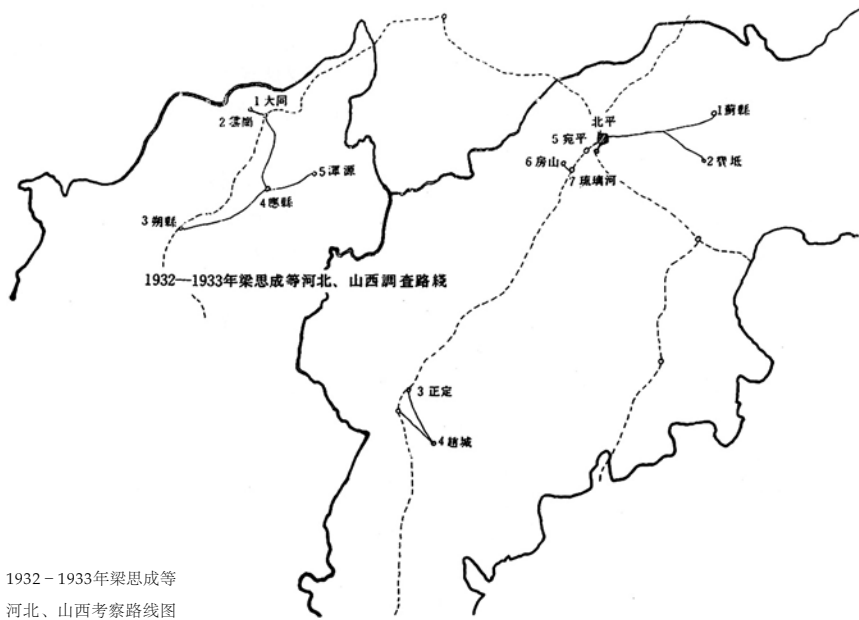


1933年学社赴大同云冈考察途中：左起为莫宗江、林徽因、刘敦桢



## 1933

1933年4月、11月，梁思成、莫宗江两次赴河北正定考察，对隆兴寺、府文庙、县文庙、正定四塔、开元寺钟楼、阳和楼等多处古迹进行了调查、测绘。林徽因亦于11月同行。



1932—1933年梁思成等  
河北、山西考察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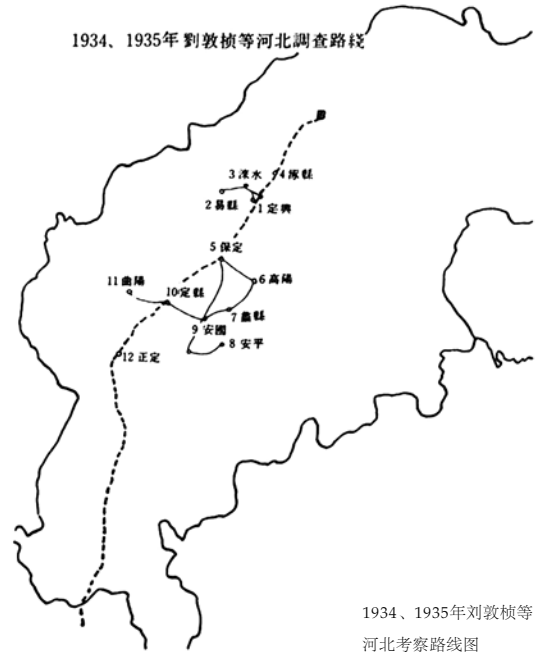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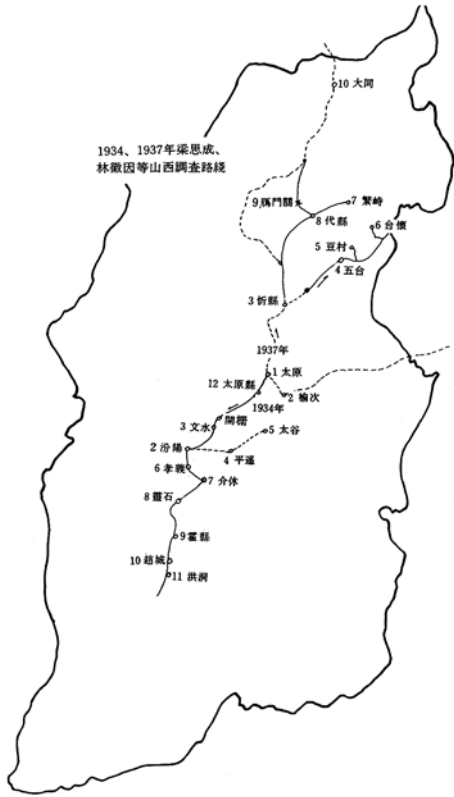


1933年梁思成（左）、  
莫宗江（右）测绘赵县安济桥

同年9月，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一行考察了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上下华严寺、善化寺等古建筑；之后梁、刘、莫继续考察应县木塔——该塔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塔；再之后梁、莫测绘应县木塔，并赴浑源考察悬空寺。

11月，梁思成、莫宗江赴河北赵县考察并测绘了建于隋代的赵州桥以及宋代陀罗尼经幢等古迹。

1934年、1937年梁思成、  
林徽因等山西考察路线图



1934、1935年劉敦楨等  
河北考察路線圖

1934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与美国友人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一同考察山西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等地的四十余处古建筑。

同年9月，刘敦楨、莫宗江、陈明达赴河北定兴、易县、涿水考察。



1934年梁思成等浙江考察路线图

## 1934

10月，梁思成、林徽因、刘致平赴杭州商讨六和塔重修计划，并考察、测绘灵隐寺双石塔及闸口白塔（建于五代末期）。杭州的工作完毕后，梁、林又赴浙南的宣平延福寺，经调查鉴定延福寺确是元泰定三年（1326年）的作品。江南的气候本不宜于木建筑之保存，他们此行不仅发现了元代的延福寺，又在金华天宁寺发现了一座元代大殿，实属难得。

同年，中央研究院委托学社测绘故宫，截至1937年，梁思成率邵力工等测绘故宫建筑六十余处，可惜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测绘工作未能完成。



1935年梁思成与其弟、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安阳

## 1935

---

1935年2月，梁思成、莫宗江测绘曲阜孔庙并做了修葺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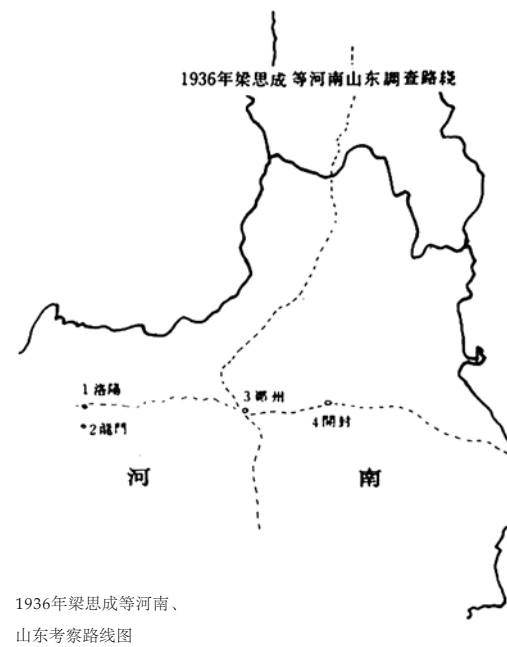
同年5月，梁思成赴安阳观摩其弟梁思永的考古发掘成果，顺便考察安阳古建筑。

刘敦桢、陈明达、赵法参等考察河北8个县三十多处古建筑。

---

8—9月，刘敦桢、梁思成、卢树森、夏昌世等考察测绘苏州古建筑。

10月刘敦桢、陈明达、邵力工、莫宗江调查测绘北平护国寺等古建筑。



1936年5月，刘敦楨、陈明达、赵正之赴河南13个县考察，考察了登封少林寺宋代建的初祖庵及唐代的净藏禅师塔，及北魏（320年）建的嵩山嵩岳寺塔。5月28日，梁思成、林徽因抵洛阳，与刘敦楨一行一同考察龙门石窟。

6月，梁思成、林徽因等赴开封及山东11个县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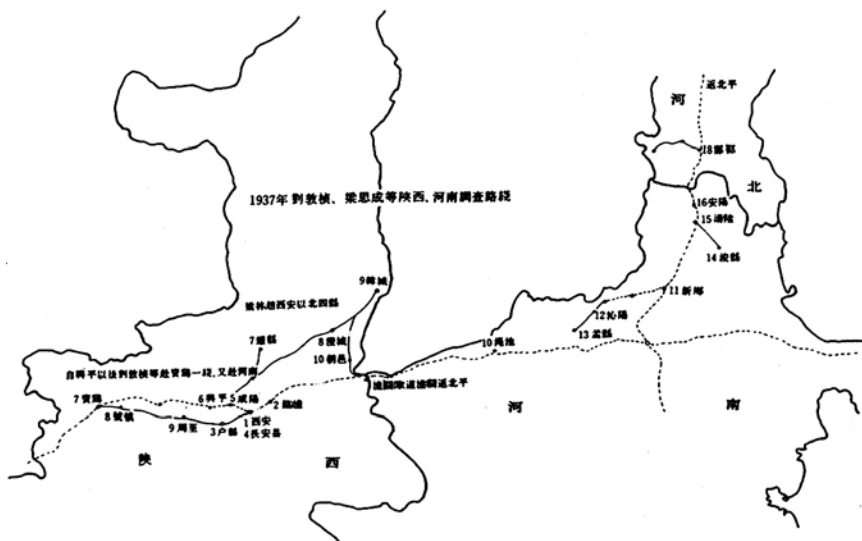


1936

10月，梁思成、莫宗江、麦伊增再赴山西考察晋汾古建筑，  
11月继续赴陕西考察。

10月，刘敦桢、陈明达、赵正之再赴河南、河北及山东16个县考察。

由于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在即，学社同仁感到时间紧迫、责任重大，于是马不停蹄、争分夺秒地展开华北、中原地区的古建筑考察，唯恐战争爆发，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化为灰烬。



1937年刘敦楨、梁思成等  
陕西、河南考察路线图



1937年梁思成在五台山  
佛光寺东大殿内

## 1937

1937年5月，刘敦楨、赵正之、麦伊增赴河南、陕西19个县考察。梁思成、林徽因一同参与了西安古建筑考察。



1937年林徽因在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内与“功德主”宁公遇塑像合影



1937年林徽因在测绘五台山佛光寺唐代经幢

6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赴山西五台山考察，并发现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的佛光寺东大殿，这是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考察中最重大的发现。此行还发现了北宋建筑榆次永寿寺雨花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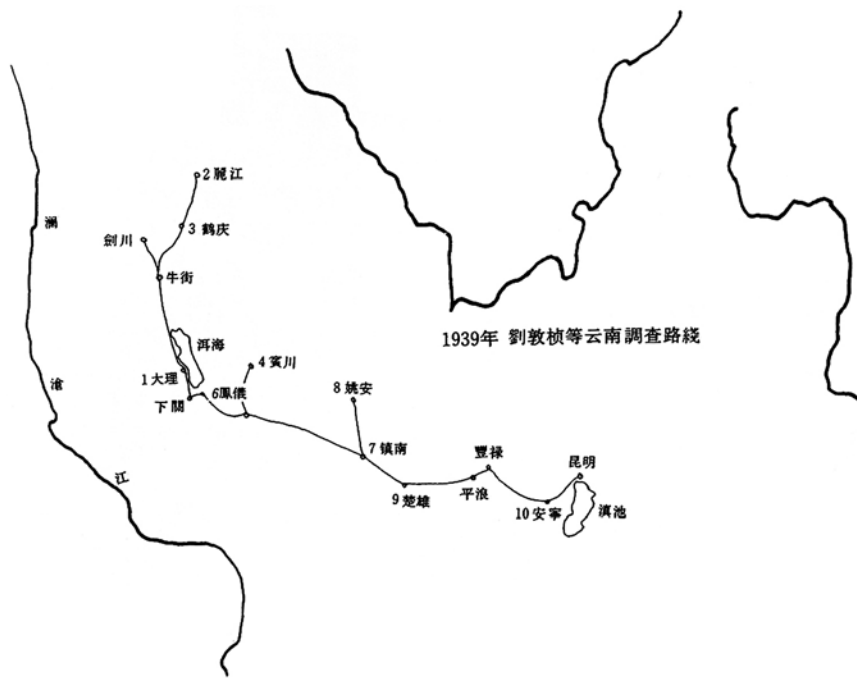
1932—1937年，学社考察过的县市有137个，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成绩斐然。



1938年中国营造学社在  
昆明麦地村兴国庵的工作室

---

抗日战争爆发，梁思成被迫迁往昆明，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也陆续迁往昆明，遂成立了营造学社昆明分队。



1938年刘敦桢等云南考察路线图

1938

10—11月，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考察昆明古建筑；11月，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继续赴滇西北9个县进行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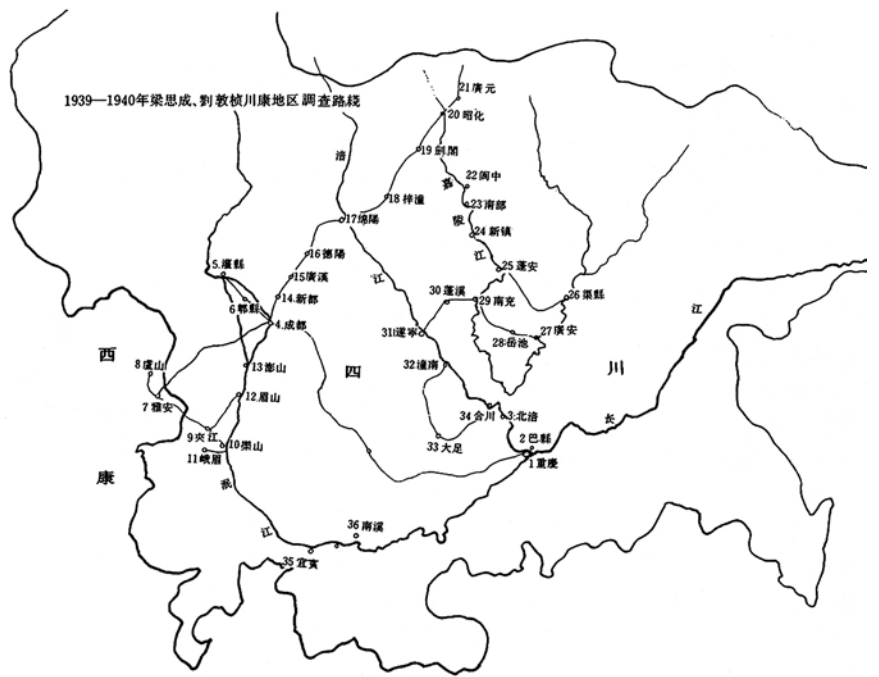
## 1939

左：  
1939年梁思成在测绘雅安高颐阙

右：  
1939年梁思成在测绘绵阳平阳府君阙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带领学社成员考察川康地区35个县的古建筑730余处，包括汉阙、崖墓和摩崖石刻等，这是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野外考察。

1939—1940年梁思成、  
刘敦桢川康地区考察路  
线图





1940年冬，学社跟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

1941—1943年，中央大学学生卢绳、叶仲玘到学社来进修中国古建筑，王世襄也从北平赴李庄参加学社工作。

1941年以后，刘敦桢集中精力整理西南地区调查的资料，撰写了大批考察报告及论文。



梁思成在李庄营造学社

## 1940—1945

1942—1943年，学社派陈明达参与中央博物院的彭山崖墓考古发掘，莫宗江参与成都王建墓考古发掘，刘致平参与广汉县志的修编。

1942—1944年，梁思成编写了《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版）两部重要著作，本展览的大部分图纸即绘制于这一时期。病榻上的林徽因与卢绳参与了《中国建筑史》宋辽时期的文献收集及注释工作。



莫宗江（前）、梁思成  
在李庄营造学社

1943年，莫宗江、卢绳测绘宜宾旧州坝白塔以及李庄旋螺殿。

1944年，莫宗江、王世襄、罗哲文测绘李庄宋墓；刘致平考察成都清真寺、李庄民居。

同年，学社克服重重困难恢复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采用石印出版。

同年，梁思成率莫宗江等编写《战时文物建筑保护目录》，使许多珍贵古建筑免于战火。



林徽因在李庄病榻之上



《图像中国建筑史》  
(英文版)书影

---

## 1940—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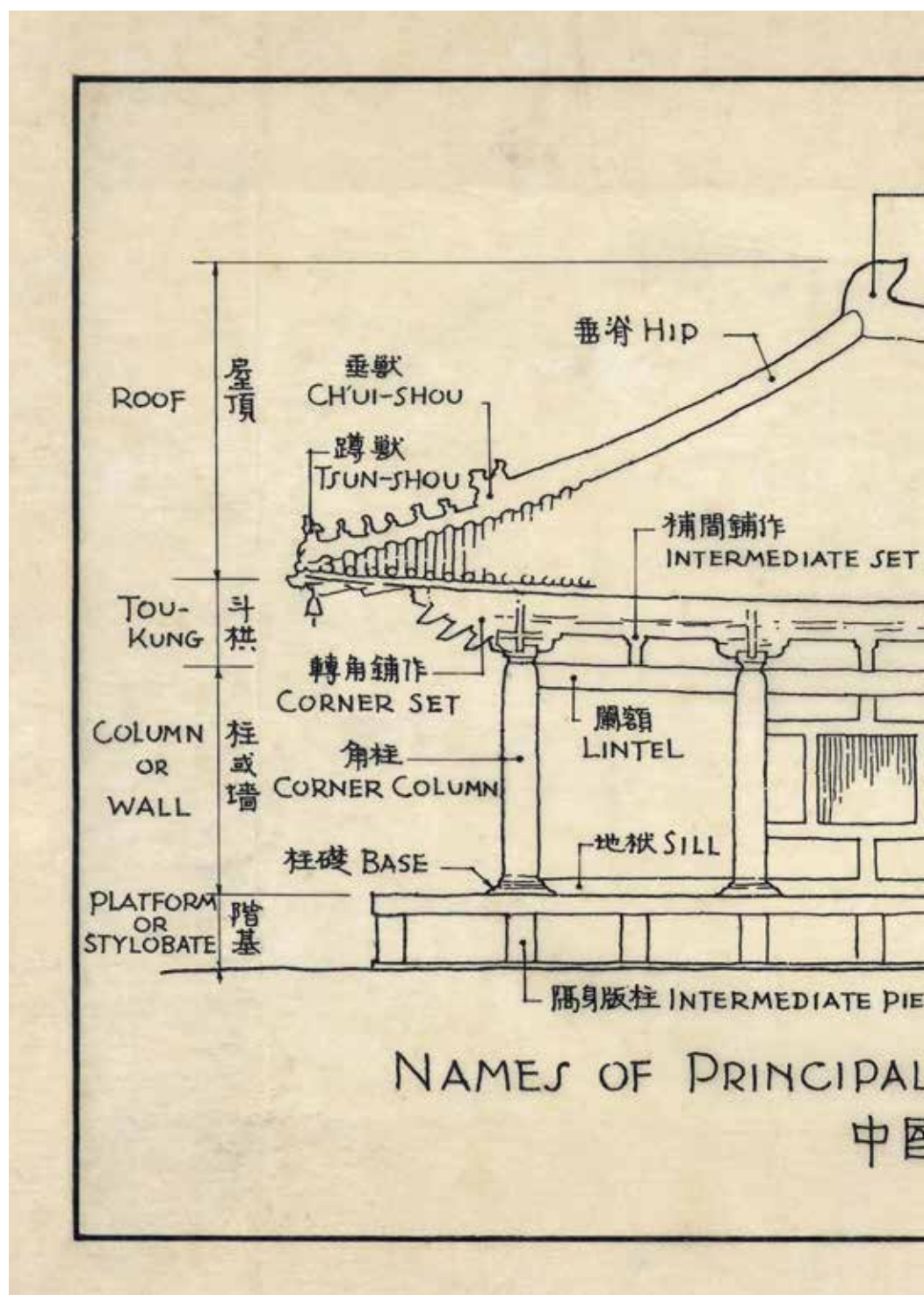
1945年，抗战胜利，学社仅余梁思成、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四人，经费来源已经山穷水尽。教育部建议将学社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或中央博物馆合并。梁思成考虑到战后国家建设将需要大批建设人才，遂决定到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中国营造学社从此结束。



《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稿

# 总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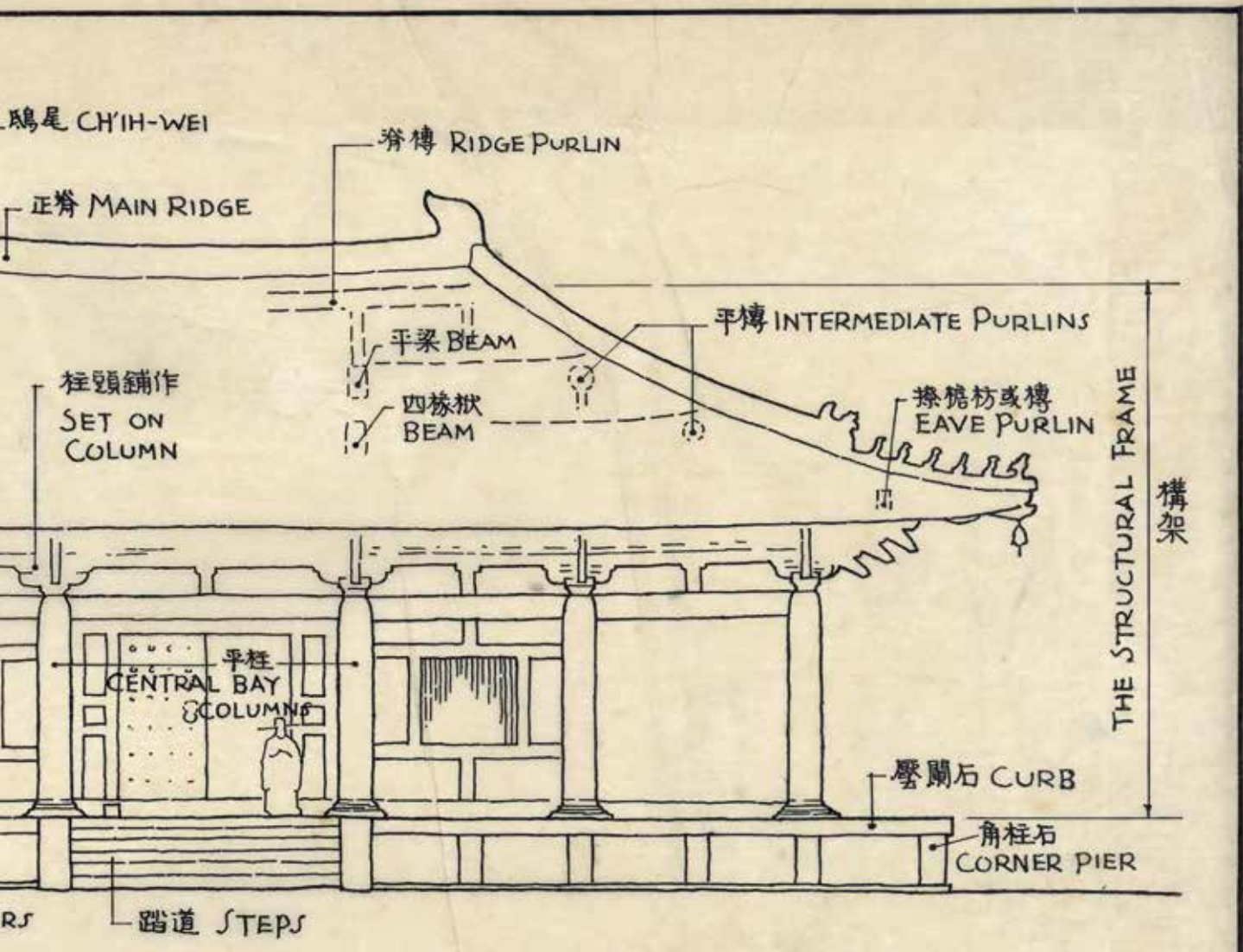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建筑结构体系的主要特征及其平面、立面、斗栱、细部手法的演变，以及两部重要的“文法课本”——北宋《营造法式》及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



中国建筑主要部分名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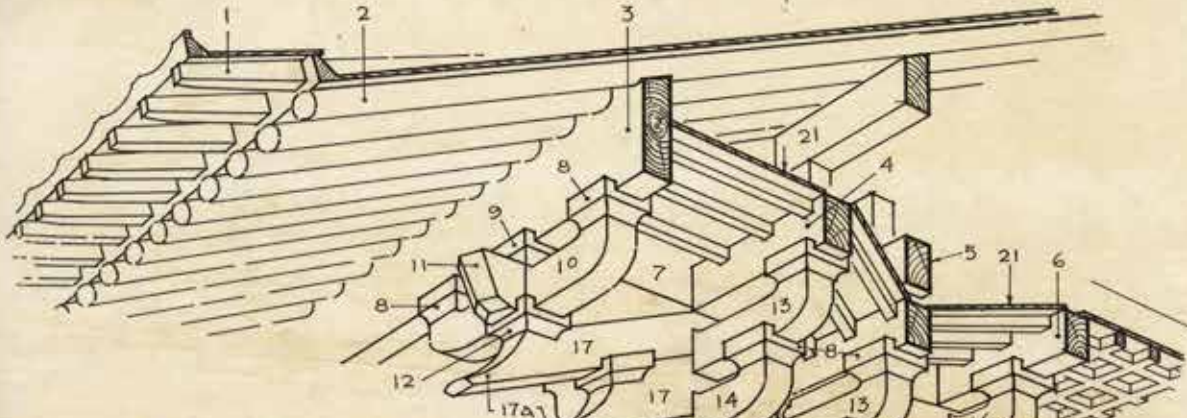
Names of Principal Parts of A Chinese Building

尺寸: 210 mm × 340 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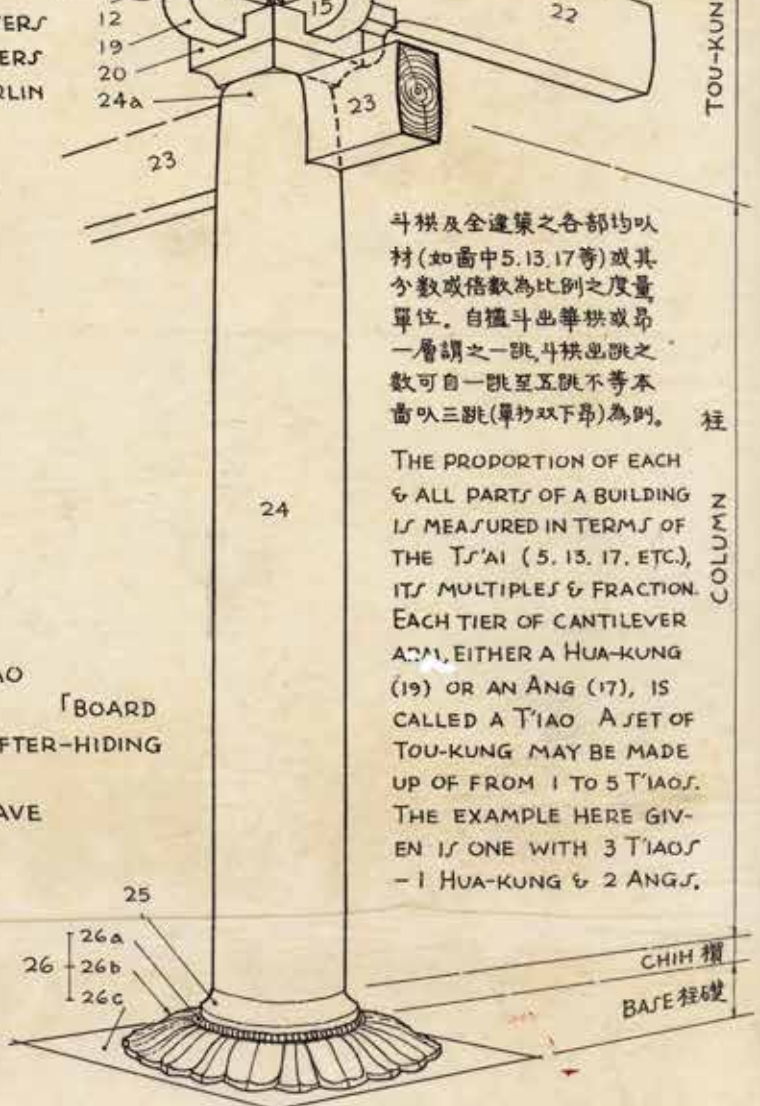
PARTS OF A CHINESE BUILDING

中國建築主要部份名稱圖



LEGEND

- 1 飛 椽 FEI-CH'UAN, FLYING-RAFTERS
- 2 檐 椽 YEN-CHUAN, EAVE-RAFTERS
- 3 撩 檐 枋 LIAO-YEN-FANG, EAVE-PURLIN
- 4 羅 漢 枋 LO-HAN-FANG, TIE
- 5 柱 頭 枋 CHU-T'OU-FANG, TIE
- 6 井 口 枋 CHING-K'OU-FANG, TIE
- 7 襯 枋 頭 CH'EN-FANG-T'OU
- 8 散 斗 SHAN-TOU
- 9 齊 心 斗 CH'I-SIN-TOU
- 10 令 拱 LING-KUNG
- 11 耍 頭 SHUA-T'OU
- 12 交 互 斗 CHIAO-HU-TOU
- 13 慢 拱 MAN-KUNG
- 14 瓜 子 拱 KUA-TZU-KUNG
- 15 泥 道 拱 NI-TAO-KUNG
- 16 騎 狀 拱 CH'I-FU-KUNG
- 17 昂 ANG
- 17a 昂 嘴 BEAK OF THE ANG
- 18 華 頭 子 HUA-T'OU-TZÜ
- 19 華 拱 HUA-KUNG, 抄 CH'AO
- 20 攪 斗 LU-TOU
- 21 遮 椽 版 CHÊ-CH'UAN-PAN, RAFTER-HIDING
- 22 擔 枋 BEAM
- 23 闌 額 LINTEL OR ARCHITRAVE
- 24 柱 COLUMN
- 24a 柱 頭 TOP OF COLUMN
- 25 檼 CHIH
- 26 柱 礎 BASE
- 26a 盆 唇 P'EN-CH'UN OR Lip
- 26b 覆 盆 FU-P'EN OR PAN
- 26c 礎 PLINTH



斗拱及全建築之各部均以材(如圖中5, 13, 17等)或其分數或倍數為比例之度量單位。自攪斗出華拱或昂一層謂之一跳, 斗拱出跳之數可自一跳至五跳不等, 本圖以三跳(單抄雙昂)為例。

THE PROPORTION OF EACH & ALL PARTS OF A BUILDING IS MEASURED IN TERMS OF THE TS'AI (5, 13, 17, ETC.), ITS MULTIPLES & FRACTION. EACH TIER OF CANTILEVER ARM, EITHER A HUA-KUNG (19) OR AN ANG (17), IS CALLED A TIAO. A SET OF TOU-KUNG MAY BE MADE UP OF FROM 1 TO 5 TIAOS. THE EXAMPLE HERE GIVEN IS ONE WITH 3 TIAOS - 1 HUA-KUNG & 2 ANG'S.

中國建築之“ORDER”·斗拱·檐柱·柱礎 THE CHINESE “ORDER”

中国建筑之“ORDER”——斗栱、  
檐柱、柱础

The Chinese "ORDER"

尺寸：420 mm × 325 mm

宋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图样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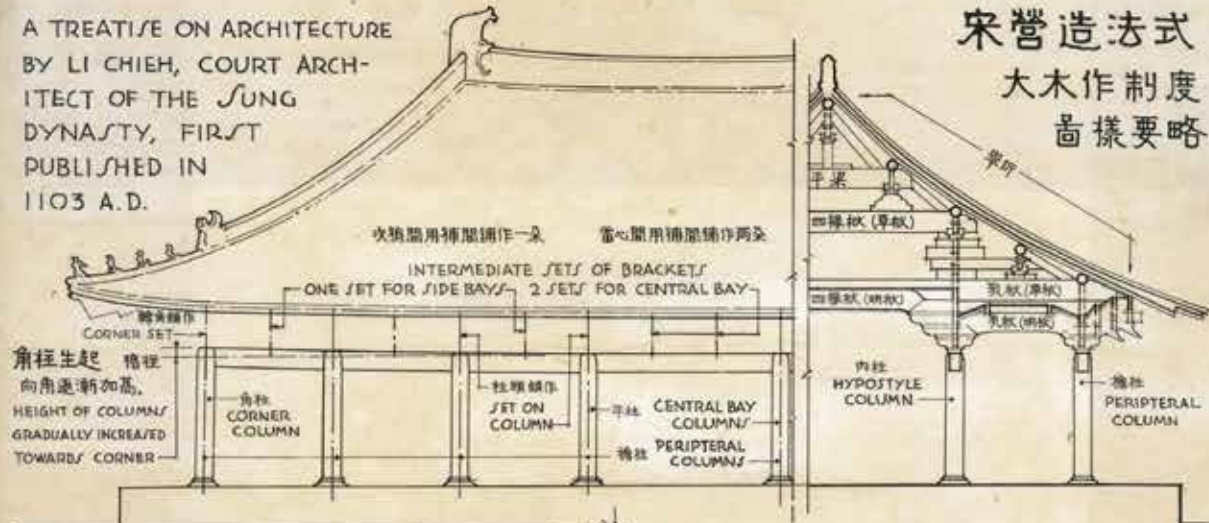
Rules for Structural Carpentry  
According to *Ying-Tsao-Fa-Shih*  
(Song Dynasty)

尺寸: 420 mm × 325 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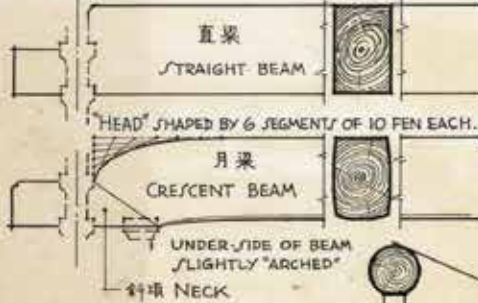
# RULES FOR STRUCTURAL CARPENTRY ACCORDING TO YING-TSAO-FA-SHIH.

A TREATISE ON ARCHITECTURE  
BY LI CHIEH, COURT ARCH-  
ITECT OF THE SUNG  
DYNASTY, FIRST  
PUBLISHED IN  
1103 A.D.

## 宋營造法式 大木作制度 圖樣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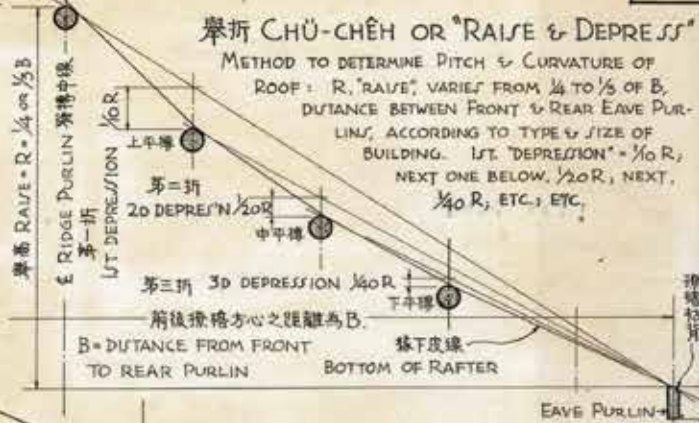


梁 BEAM 梁有直梁月梁二種。月梁梁首以六瓣卷殺，依  
說數層料項，梁頭順起。 2 TYPES OF BEAMS:  
STRAIGHT BEAM & 'CRESCENT BE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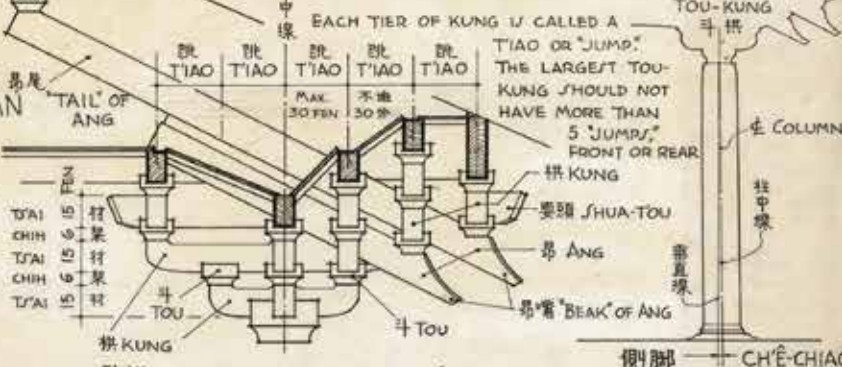
### 舉折 CHÜ-CHÊN OR 'RAISE & DEPRESS'

METHOD TO DETERMINE PITCH & CURVATURE OF  
ROOF: R, 'RAISE', VARIES FROM  $\frac{1}{4}$  TO  $\frac{1}{2}$  OF B,  
DISTANCE BETWEEN FRONT & REAR EAVE PUR-  
LINS, ACCORDING TO TYPE & SIZE OF  
BUILDING. 1ST 'DEPRESSION' =  $\frac{1}{10}$  R,  
NEXT ONE BELOW,  $\frac{1}{20}$  R, NEXT,  
 $\frac{1}{40}$  R, ETC., ETC.



### 梭柱 'SHUTTLE-SHAPED' COLUMN

IF A COLUMN WITH ENTAF-  
LIF, DETERMINED BY SHAP-  
ING UPPER THIRD WITH 3  
SEGMENTS. THE LOWER  
TWO-THIRD REMAINS  
STRAIGHT. 梭柱之  
制，隨柱之長，分為三分上  
一分又分為三分，如椽卷殺。  
柱頭四分卷殺如覆盆樣。  
柱徑與高無規定比例。



### 側脚 CH'É-CHIAO

凡支柱並令柱首微收向內。  
柱脚微出向外謂之側脚。  
TOP OF COLUMN LEANS  
INWARD 1% OF HEIGHT.



材梁分 造屋之制，以材為粗，材有八等，厚薄之大小因  
而用之。名以其材之廣(高)分為十五分，以十分為厚。凡屋  
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長，曲直舉折之勢，純量之宜，皆以材用  
材之十分為制度焉。

TS'AI, CHIH & FEN: TS'AI, THE STANDARD TIMBER FOR ALL CON-  
STRUCTION, IS GRADED INTO 8 CLASSES. THE DEPTH OF EACH TS'AI  
IS DIVIDED INTO 15 FEN; 10 FEN, GIVES THICKNESS OF TS'AI. THE  
PROPORTION OF EVERY PART OF THE BUILDING IS THUS MEASURED IN  
TERMS OF THE FEN.



清工程做法则例（雍正十二年工部颁布刊行）大式大木图样要略

Rules for Structural Carpentry  
According to *Kung-Ch'eng-Tso-Fa*  
(Qing Dynasty)

尺寸：420 mm × 320 mm

历代木构殿堂外观演变图

Evolution of the General Appearance  
of Timber-Framed Halls

尺寸：440 mm × 330 mm

# 歷代木構殿堂外觀演變圖

## EVOLUTION OF THE GENERAL APPEARANCE OF TIMBER-FRAMED HALLS

比例尺 1:100 0 50 meters

豪勁時期

PERIOD OF VIGOUR  
約 APPROX. 600-1050

吳殿(四阿殿·廡殿)  
HIP-ROOFED



五台佛光寺正殿 857  
MAIN HALL - FO-KUANG SSU - WU-TAI

唐  
T'ANG

醇和時期

PERIOD OF ELEGANCE  
約 APPROX. 1000-1400



大同善化寺正殿 CA. 1040?   
MAIN HALL - SHAN-HUA SSU - TA-T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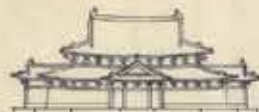
遼及宋初  
LIAO &  
EARLY SUNG

曹殿(九脊殿·歇山殿)  
GABLE AND HIP-ROOF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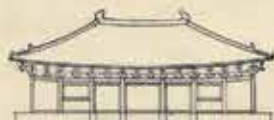


大同華嚴寺薄伽教殿 1038  
LIBRARY - HUA-YEN SSU - TA-TUNG

殿厦(歇山)向前  
GABLE FACING FRONT



正定龍興寺摩尼殿 CA. 970?   
MO-NI TIEN - LUNG-HSING SSU - CHENG-TING



晉蓮花式 1103  
ACCORDING TO YING-TSAO FA-SHIH

北宋末  
LATE NORTH-SUNG



嵩山少林寺初祖殿 1125  
CH'U-TSU AN - SHAO-LIN SSU - SUNG M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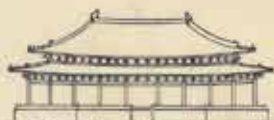


大同善化寺三聖殿 1118-43  
FRONT HALL - SHAN-HUA SSU - TA-TUNG

金  
CHIN



應縣淨土寺正殿 1124  
MAIN HALL - CHING-TU SSU - YING HSIEN



白雲山北極廟地亭殿 1270  
MAIN HALL - PEI-YUEH MIAO - CH'U-YANG

元  
Y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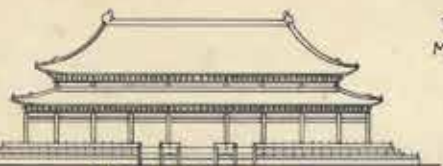
正定陽和塔 CA. 1260  
YANG-HO LOU - CHENG-TING



白水聖母廟 1283  
SHENG-MU MIAO - WEN-S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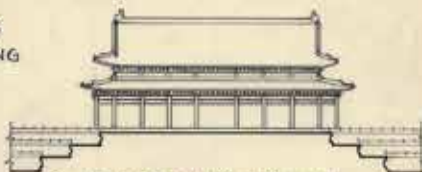
穩重時期

PERIOD OF RIGIDITY  
約 APPROX. 1400-1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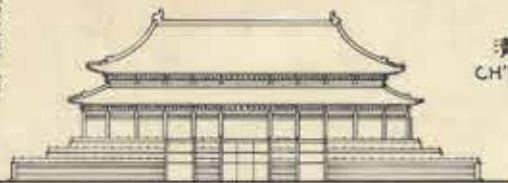


昌平明長陵祔墓殿 1415-26  
SACRIFICIAL HALL - TOMB OF EMPR YUNG-LO - CHANG-PING

明  
M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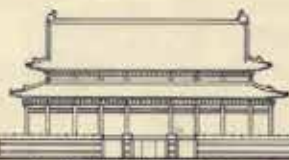


北平故宮建極殿(保和殿) 1615  
REAR AUDIENCE HALL - IMPERIAL PALACES - PEIPING



北平故宮太和殿 1697  
MAIN AUDIENCE HALL - IMPERIAL PALACES - PEIPING

清  
CH'ING



北平故宮太和門 1894  
TAI-HO MEN - IMPERIAL PALACES - PEIPING

△立面圖根據實測平面及照片繪成。

Elevation drawn from measured plan and photograph.

▲未經實測，立面圖完全自照片摹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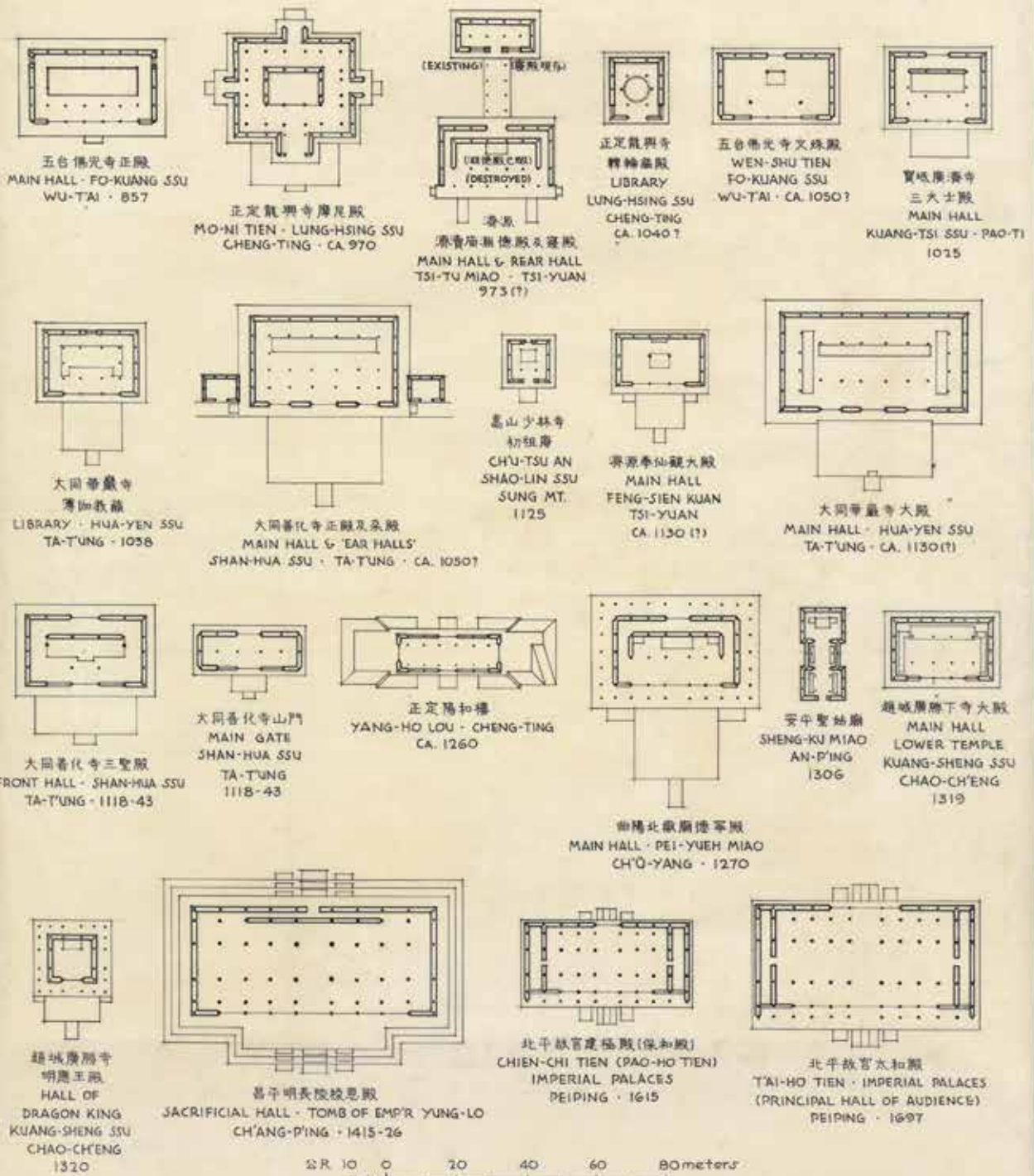
Not measured, elevation drawn solely from photograph.

無標註各處均經全部測繪。

All other elevations drawn from complete measurements.

# 歷代殿堂平面及列柱位置比較圖

## COMPARISON OF PLAN SHAPES AND COLUMNIATION OF TIMBER-FRAMED HALLS



历代殿堂平面及列柱位置比较图

Comparison of Plan Shapes and  
Columniation of Timber-Framed Halls

尺寸: 435 mm × 330 mm

历代斗栱演变图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Order"

尺寸：420 mm × 320 mm